

## 明中晚期江西詩、文社集活動的 發展與動向

張藝曦\*

關於明代社集的研究，過去較偏重在江南一帶的詩、文社集，而對同時期江西的社集注意不多，但其實明中晚期江西的社集數量極多，活動力與影響力也不亞於同時間江南的社集。明中期文學復古運動盛時，江西南昌便有芙蓉社應此而起，該社由士人與宗室攜手共同主持，是江西詩壇最具代表性的社集之一。萬曆中期以後，隨著制藝風潮的興起，不少士人紛紛分其力於制藝寫作，於是出現許多制藝文社，以豫章社為代表。相對的，宗室主持的詩社活動被斥為是閒遊逸樂之事，於是年輕士人成立匡山社，在這類新的詩社中，士人同時兼習制藝與詩作，而且以制藝為主而詩作為輔。從(1)、詩社獨盛，到詩社與制藝文社並行；以及(2)、從士人與宗室合作，到分別主持社集，可視為明中晚期江西社集的兩個重要發展動向。

關鍵詞：復古派、宗室、八股文、芙蓉社、豫章社

---

\*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關於明末社集的研究，過去較偏重在江南一帶，尤其以復社為主的活動。復社有確定的成立時間、目標與宗旨，以及成員與社集的活動記錄，相對的，江南以外的其他地區雖也有許多大小社集，但社集相關記載往往過於片段或零碎，所以研究上便不易深入。<sup>1</sup>近幾年則有

<sup>1</sup> 關於明人社集的研究，較多放在文學史的脈絡下討論，郭紹虞(1893-1984)的〈明代的文人集團〉(收入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518-610)是這個領域的名作。該文是明代詩社年表，從這個年表可以很容易看出，大約到了明中期以後，詩社倍增，這應跟前後七子所倡導的文學復古運動有關。郭紹虞認為萬曆朝(1573-1620)以後的社集漸多涉入政治活動，這點跟謝國楨(1901-1982)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正相呼應。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臺北：南天書局，1998)對眾多社集作出分類，而何宗美長期蒐集社集相關資料，撰作多本專著，如《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公安派結社考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及《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而其近作《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則是藉由大規模彙整詩文社集與制藝文社的資料，以討論文學流派與文學思潮的轉變。李玉栓《明代文人結社考》(北京：中華書局，2013)也是對社集資料的整理與考訂之作。關於復社的專門研究，則有日本學者小野和子的大作《明季党社考——東林黨と復社》(京都：同朋舍，1996)，主要是從政治史及政治文化史的角度談萬曆朝以後從東林黨到復社的黨爭。丁國祥的《復社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則是從文學史的角度討論復社成員的活動。另外，馮玉榮《明末清初松江士人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則聚焦在幾社成員的社集活動與地方角色。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者把眼光放在個別有文集留下的人物身上，這類作法亦有其意義，但個別人物畢竟不等於社集。個人可以有很多面相，但當一群人共同結為社集，便在某個部分有所交集，或理念相近相同，以致於凸顯某個面相，而成為這個社集的特色。當同一類的社集增多時，則可視為某種風潮或流行。同樣的，在研究某種運動或風潮時，儘管不能忽略一些大人物的貢獻，但也不能不談社集的活動及作用。

一些文章是從政治、家族、地域性、城市生活、文化轉型切入，而不只是從社集論社集，而且將眼光擴大到士階層相關的其他階層(如醫者)，以及東亞周邊各國，從更多元也更整體的眼光，以中國為中心看東亞世界的社集發展。<sup>2</sup>

過去較少人注意江西的社集，儘管人們熟知江右四大家——陳際泰(1567-1641)、章世純(1575-1644)、艾南英(1583-1646)、羅萬藻(?-1647)四人之名，但除此以外則所知不多。其實江西的社集活動極盛，足以與同時期的江南並列，作為江南以外的另一個中心。江西的社集發展與三股風潮有關：一是明中期以前後七子(尤其是後七子)為首的文學復古運動，<sup>3</sup>一是陽明心學的講學活動，一是明末制藝(即八股文)風潮。<sup>4</sup>後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以江南為中心所在，而江西亦受其影響；<sup>5</sup>陽明心學的

2 請見張藝曠、王昌偉、許齊雄、何淑宜編，《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將出版)。

3 關於文學復古運動的研究非常多，本文主要參考廖可斌、鄭利華等人的成果及見解，請見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與鄭利華，《前後七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其他另有如黃毅，《明代唐宋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也是相關主題的重要著作。

4 關於這三股風潮與士人的關係，另請參考張藝曠，〈明中晚期的思想文化風潮與士人活動〉，《中華文物學會二〇一九年刊》，(臺北，2019.10)，頁128-136；張藝曠，〈明中晚期士人社集與思潮發展〉，收入林宛儒主編，《以文會友——雅集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頁250-261。

5 文學復古運動在詩、古文辭各有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是最讓人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復古派流風下的江西社集對古文辭較少措意，而更多側重在詩作上。如芙蓉社的余曰德(1514-1583)所留下的集子，14卷全都是詩作，而王世貞(1526-1590)所稱道的也是他的古近體詩；同社朱多煃雖無詩文集存世，而其社友朱拱樞、朱多熽、王士昌(1561-1626)等人所留下也是詩集。匡山社亦屬於詩社性質，戴九玄(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所

流行雖廣，以江西的江右陽明學派為正統；明末制藝風潮在江西初始於 1600 年左右，而在萬曆朝(1573-1620)後期臻於極盛，有江右四大家及豫章社的興起，與江南的復社群體分庭抗禮。

明中期的心學運動與文學復古運動的共同特色，即促成參與階層或範圍的擴大。心學普遍流行於一般士人之間，甚至布衣、處士、農工商賈也有參與講學的例子。泰州學派走得最遠，但不只是泰州學派有此趨向而已，即連號稱正統的江右陽明學派，儘管參與者以士人、布衣、處士為多，但亦可見下層人民參與在講會中。<sup>6</sup>文學復古運動以復古派為中心，復古派主張文學創作必須以古人為典型，古文辭祖述以《史記》為主的秦漢文，詩作則倣效以杜甫(712-770)為首的盛唐詩，或益之以漢魏古體，排斥宋詩。在創作方法上，嚴守古人成法，不但用語措辭上形似，也要求內容感情上的神似。這種簡率、樸質，甚至帶點生硬的文體，是一種寓創新於復古的文學主張。<sup>7</sup>由於復古派講究模擬，在方法上直截簡易，讓人們更容易入手寫作詩文，所以受到不

留下的《匡山社集》，內容雖有社友相互唱酬之作，但社集中如汪應婁、喻氏兄弟、鄧文明等人都以詩作著稱，萬時華(1590-1639)亦因詩作見賞而受邀與會。一般泛稱詩文社集時，文指的是古文辭，但有時我們也會在一些個案看到某些詩社中有制藝的寫作或討論，所以讓人不易確切區劃詩文社集與制藝文社的分別，以及懷疑是否有從詩文社集到制藝文社的趨勢。但明中期江西復古派的詩社正好提供很好的例子，由於宗室是詩社的主要成員，而宗室不必應試，也不必習制藝，所以我們可以確定當時的詩社就是純粹的詩社而已，而跟制藝寫作無關。

<sup>6</sup> 有關陽明講會的研究，可參考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陽明心學家的活動，請見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繁年》(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關於江右陽明學派的研究，請見張藝曇，《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

<sup>7</sup> 吉川幸次郎，《元明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頁 179-180。

少人的支持與歡迎。有人甚至表示，創作之道應如畫家臨摹古帖一樣，描到維妙維肖便算成功，這種方法可謂簡易率直之至，所以吸收許多民間才俊的參與。吉川幸次郎(1904-1980)指出，隨著文學復古運動的盛行，民間詩壇也日益活躍，當時作詩的已不僅限於官員、士大夫，或富農、富商之類的地方有力人士，即使在陋巷中也有詩人，也因此讓明中期以後的詩作數量達到高峰。<sup>8</sup>

與上述兩波運動不同，明末的制藝風潮則是在士人群體間流行的風潮，由於明確以科舉為目標，所以不僅僧、道、武將、宗室被制藝文社排除在外，布衣、處士亦甚罕見。明末萬時華在為友人米子京(字)彙刻的《西子蘋》所作序中，卻表示制藝廣泛影響士人的程度是詩賦所不能及的，他說：

世之吊西子者，賦或千言，詩幾萬什，兼之制舉牘，蓋自予友米子京始。……世摻軸能以詩賦擅者什四五，不能為制舉牘者，百無一焉。自子京廣其途以納之，世之憐西子，不欲以詩賦擅者，盡得解衣盤薄，無鬱伊于筆墨之間，此文章快事，抑亦西子之遭也。……蓋吊西子不奇于詞賦，奇于制舉牘，相與成子京之奇舉也。<sup>9</sup>

此段重點在「詩賦擅者什四五，不能為制舉牘者，百無一焉」。過去憑弔西施的人，有人作賦，有人作詩，而米子京則在詩賦以外兼收制藝，使得原本受限於詩賦能力而無法憑弔西施的人，如今也可將其心思形諸筆墨之間。此正凸顯制藝對士人的影響更廣於詩作。

在此必須說明兩點：首先，儘管明中期以來已有不少地方士人成

<sup>8</sup> 吉川幸次郎，《元明詩概說》，頁179-181。

<sup>9</sup> 萬時華，《溉園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4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卷2，〈彙刻西子蘋序〉，頁24-25。

立文社或文會，但這類文社或文會在明末各地大量出現，則是頗為特殊的現象，加上有豫章社與復社引領一世之視聽，而且不少士人把制藝視為是與詩、古文辭並列的文體，積極探討這個文體的各種可能，所以本文將明末此波風潮稱之為制藝風潮。其次，詩作、心學與制藝，並不是截然分立的三種範疇，彼此之間甚至沒有明確的界線，而常交錯交集。<sup>10</sup>這三個範疇的人各自形成社群，各社群有各自關注的課題。當社群中的人以結社的方式定期聚集或交流，這類社集會更凸顯該社群的特色。單一個人的想法可以有多樣性與多重性，但社集則會強調某個面相，而忽略其他面相。尤其是當明中期的心學運動以心學為創新，文學復古運動以復古為創新，都在挑戰傳統及既有的理學或文學的勢力，這會讓人更想尋求相同理念的同儕，於是某種理念便容易以社集的形式被強化或標舉出來。也因此，在討論詩文、心學與制藝三者，用「社」可以更好說明彼此間的錯雜、競合的關係。

10 如王守仁(1472-1529)早年曾參加李夢陽(1473-1530)的詩社，不久退出而另闢心學社群，據此看似心學與復古派詩文之間的交集不大，但其實仍有不少跨足在兩個社群的例子。湯顯祖是很好的例子，他並不屬於復古派，但他是著名詩文戲曲作者，同時也拜羅汝芳為師。另如萬虞愷，他既參與在復古派的活動中，同時也師從王守仁及其弟子歐陽德(1496-1554)等人，在他留下的文集中，既有顧起綸(1517-1587)為其評點詩作，也有許多與心學家的書信往來。見萬虞愷(1505-1588)的《楓潭集鈔》，藏於日本內閣文庫。該集有詩兩卷，由吳維嶽(1514-1569)評校而顧起綸評選，所以不少詩作旁都有顧起綸的評語。吳維嶽是廣五子之一，而顧起綸也跟復古派的關係較深。萬虞愷生平可見鄧以讚，〈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致仕楓潭萬公行狀〉，收入萬虞愷，《楓潭集鈔》(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內閣文庫藏明嘉靖四十年[1561]刊本)，附錄，頁1-16。此外，俞長城(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士)《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文盛堂懷德堂全梓清乾隆戊午年[1738]重鐫本)中所錄制藝名家之中便不乏理學家或詩文作者，如李夢陽、湯顯祖(1550-1616)、鄒守益(1491-1562)、羅洪先(1504-1564)等人。

過去對各別風潮或運動的研究較多，但較少注意從詩作到制藝，或從心學到制藝，以及三者間的交涉消長來談。我在另一篇文章〈明及清初地方小讀書人的社集活動——以江西金溪為例〉討論撫州府金溪縣這個個案，利用思想史研究者較少用的族譜資料，以重構在地的社集發展史。從中可以具體看到金溪這個地方從詩社與心學講會到制藝文社的轉變。<sup>11</sup>由於金溪土人留下的文集不多，所以該文僅能從外緣看不同性質社集的成立與沒落，而本文希望從較大範圍談明中晚期的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制藝風潮帶來的影響，以及從詩、文社集到制藝文社的轉變。我們將可看到從明中期江西士人與宗室共組詩社，到後來的分流，以及制藝文社在明末江西大盛，這正可證實明中晚期江西經歷從詩社到制藝文社、此衰而彼盛的變動，以及士人在此波風潮中的轉向，與部分宗室的士人化。

## 二、江西的文學復古運動：士人與宗室群體

### (一) 余曰德與朱多煃：江西復古派詩社領袖

文學復古運動的代表人物有前七子與後七子，前、後七子之間並沒有直接的淵源或師承關係，前七子開啟復古之風，而後七子的影響更大。後七子以李攀龍(1514-1570)與王世貞(1526-1590)為領袖，王世貞的影響又超過李攀龍。續五子、末五子、廣五子、四十子，都是以王世貞為中心而舉出。

後七子的流風及於江西，余曰德(1514-1583)是此流風下的代表人物。余曰德，字德甫，南昌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進士，官至福建按察

<sup>11</sup> 張藝曠，〈明及清初地方小讀書人的社集活動——以江西金溪為例〉，收入張藝曠等編，《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

司副使。在《明史·文苑傳》中附王世貞傳。據載，李攀龍因與謝榛(1495-1575)不睦，削去謝榛之名，而以余曰德入後七子之列，<sup>12</sup>另又為後五子之一，<sup>13</sup>所以《豫章詩話》便以「王元美後五子篇，首南昌余曰德詩」，<sup>14</sup>凸顯余曰德的地位。王世貞對余曰德詩多有贊語，稱許余曰德詩是「大江以西一人」，<sup>15</sup>而且指其詩先後經歷三變——始因喜李攀龍而所作詩亦似李攀龍，但歸鄉以後的兩變，則已非李攀龍所能籠罩，不僅能夠自立，而且冥通於性靈、與自然合。<sup>16</sup>

宗室也是江西的文學復古運動的主力，所以喻均(1539-1605)評論明初以來江西詩壇，他先說前後七子以來，近體與七言古詩的名家不少，<sup>17</sup>接著便轉到江西，推崇余曰德與朱多煃(1534-1593)二人大振近體詩，而古詩亦佳。喻均列名於王世貞〈四十咏〉中，<sup>18</sup>也是江西詩

12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丁集上，頁431。

13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頁440。

14 郭子章，《豫章詩話》(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41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明萬曆三十年[1602]吳獻台刻本影印)，卷6，頁22。

15 王世貞，〈序〉，收入余曰德，《余德甫先生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22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首，頁3。

16 王世貞，〈序〉，收入余曰德，《余德甫先生集》，卷首，頁2-3。

17 喻均，〈朱宗良詩集序〉，收入朱多煃，《朱宗良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據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原刊本攝製)，卷首，頁1-3。

18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續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2-128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3，〈四十咏〉，頁18。其子喻應益(字叔虞)，則因能詩而為人所推重，所以在許多詩文集會中都可看到他的身影。許應鑠等修，曾作舟等纂，《(同治)南昌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81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日本國會圖書館清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影印)，卷44，〈明文苑〉，頁49。

壇的代表人物之一，<sup>19</sup>他說：

……吾鄉之詩，至嚴少師，古近體彬彬大備矣，而氣骨少遜。逮  
熊士選而近體振矣，古詩靡靡無足采。逮余德甫、朱用晦而近體  
大振矣，古詩亦瑰麗，而終不能不蹈曹生之喟。<sup>20</sup>

這篇序文是為朱多熲所作，所以在未引出的段落，對其或有溢美之處，但對余曰德、朱多煃二人的評價應為中肯之論。朱多煃、朱多熲都是宗室。

儘管從詩作的成就來評判余曰德等人是否足稱第一流詩人尚有爭議，<sup>21</sup>但若是從社集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些人都是復古派在江西的代表人物。當時江西各地的詩文社集不多，<sup>22</sup>以余曰德、朱多煃為首在南昌成立的芙蓉社則在江西社集史上有關鍵地位。過去對文學復古運動時期江西社集的關注較少，所以以下將花費一些篇幅大略介紹相關人物及活動。

19 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據明刻本影印)，頁359。

胡應麟(1551-1602)入末五子之列，但錢謙益對他的評價頗低，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頁446-447。

20 喻均，〈朱宗良詩集序〉，收入朱多熲，《朱宗良集》，卷首，頁1-3。

21 錢謙益《列朝詩集》既不錄余曰德，也不取其詩，原因是「其詩靡靡不足觀」，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778。朱彝尊(1629-1709)與四庫館臣對余曰德詩的評價也都偏低，尤其王世貞的序文雖被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之《弇州四部稿續稿》中，但「大江以西一人」這句卻被刻意刪去，亦可凸顯四庫館臣輕看余曰德的立場。見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清乾隆間武英殿刊嘉慶間後印本影印)，卷178，集部，頁5，及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續稿》，卷52，文部，〈余德甫先生詩集序〉，頁3-5。

22 如臨川有湯顯祖與帥機(1537-1595)的社集，南昌胡汝煥(1543-1603)亦曾前往與會，見帥機，《陽秋館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3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1739]修獻堂刻本影印)，卷15，〈胡孟弢見訪因訂社盟得如字〉，頁7。

## (二) 從芙蓉社到匡山社

約隆慶朝(1567-1572)時，名列復古派後五子之一的余曰德落職歸鄉，宗室朱多煃招其入王府芙蓉園唱和，於是有了芙蓉社的成立。社集場所即朱多煃所築的芙蓉園。王世貞曾為《芙蓉社吟稿》作序。<sup>23</sup>

芙蓉社的成員，士人方面，除了喻均以外，南昌及鄰縣的一些士人也在社中，較著名的有況叔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sup>24</sup>方來崇(嘉靖三十五年[1566]進士)、胡汝煥(1543-1603)、楊汝允(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等人，這批人都是當時活躍於江西文壇的人物。<sup>25</sup>宗室方面，由於宗室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亦鮮有機會進入中央朝廷任官，所以部分宗室用心於詩歌吟詠。<sup>26</sup>在全國眾多宗室王府中，江西寧王府宗室的詩作成就頗

<sup>23</sup> 葉舟、陳弘緒纂修，《(康熙)南昌郡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30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康熙刻本影印)，卷7，〈建置四〉，頁16；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9-128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66，〈芙蓉社吟稿序〉，頁14-15。

<sup>24</sup> 沈叔祺，高安縣人，地方志記載他與王世貞、余曰德游從，以聲詩相唱和。他有《大雅堂摘稿》，所收錄的詩作被評價為可以與余曰德等人比肩，見張鵬翥等修，熊松之等纂，《(同治)高安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847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清同治十年[1873]刊本影印)，卷14，〈宦蹟〉，頁27-28。地方志作者頗為其名未彰顯於世而抱不平，見謝旻等修，陶成等纂，《(雍正)江西通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78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清雍正十年[1732]刊本影印)，卷141，頁26。

<sup>25</sup> 萬時華提及晚明江西文壇的代表人物，除了湯顯祖、謝廷諒(1551-?)以外，就是方來崇、胡汝煥、饒裔(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等人。見萬時華，《溉園初集》，卷1，〈李芝山先生行狀〉，頁54。

<sup>26</sup> 見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54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為人所稱道，當時有「國朝宗藩之詩，寧府為盛」<sup>27</sup>之類的考語，其中以朱多煃、朱多炡(1541-1589)、朱多熿幾人的詩名最著。<sup>28</sup>朱多煃名列續五子之一，可謂宗室之首，朱多熿亦因王世貞稱譽「(豫章)諸王孫，賴足下先驅」而聲名大起。<sup>29</sup>我們可在一些詩文中看到士人與宗室交遊往來的記錄，<sup>30</sup>以及相關的社集活動。<sup>31</sup>方來崇、趙來亨(隆慶二年[1568]進士)等士人，與朱多熿、朱多炡、朱謀境(1530-1607)、朱謀境(1537-1619)等宗室似常合稱五子或七子，<sup>32</sup>也許有仿後七子、續五子等稱號之意。

約至萬曆中期，芙蓉社的核心成員或卒或病：余曰德卒於萬曆十一年(1583)，朱多炡卒於萬曆十七年(1589)，<sup>33</sup>朱多煃卒於萬曆二十四

影印)，《敦宿堂留書》，卷1，〈管理石城王府事鎮國中尉朱公傳〉，頁28。

27 徐勃撰，沈文倬校注，《筆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卷4，〈宗藩詩〉，頁108-109。

28 胡應麟在其《詩藪》評論所往來的宗室，除了朱睦樞(1518-1587)以外，便推朱多煃等三人，見胡應麟，《詩藪》，頁359。

29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續稿》，卷172，頁9。

30 余曰德的詩集中，以〈夏日同用晦赴吉夫舟中分賦十二體得口字〉為題的便有10首之多，每次所得的字不同，所以此處以口來表示。

31 喻均，《山居文稿》(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原刊本)，卷2，〈方士功玄隱軒詩艸序〉，頁9。

32 如歐大任(1516-1596)曾受邀弋陽王府竹在亭作客，便以「稱詩七子盡風流行」稱七人，見歐大任，《歐虞部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4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影印)，《北轍集》，卷1，〈朱宗良、方士功、朱貞吉、朱巍甫、朱佳甫、趙脩甫、彭穉脩邀集竹在亭得秋字〉，頁3。《廬館集》另有詩題〈答朱宗良、方士功、朱貞吉、彭穉修、趙脩甫五子〉，則以五子稱之，見卷3，頁16。

33 朱多炡的卒年，見李維楨，《大泌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52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刊本影印)，卷77，〈弋陽王孫貞吉墓誌銘〉，頁12。

年(1596)，<sup>34</sup>朱多熲雖然詩名最高，但病癆難行。<sup>35</sup>況叔祺、方來崇、胡汝煥等人的卒年不詳，但從相關記載來看，此時幾人即令在世，皆已少有活動。

萬曆二十七年左右佳山社的成立，則是南昌社集發展史的一段插曲。佳山社不算是重要的詩社，相關資料不多，不足以與芙蓉社相提並論。<sup>36</sup>主導成立佳山社的張位(1538-1605)本是首輔，在第一次妖書案中被黜為民後返回南昌故里，<sup>37</sup>所以社集地點之一即張位的杏花樓。該社核心成員包括喻均、汪應婁、宗室朱謀埠(1564-1624)等人。<sup>38</sup>朱謀埠，字明父，一字鬱儀，私諡貞靜先生。朱鬱儀(以下皆用此稱)晚朱多煃一輩，後文將再詳及。汪應婁則是南昌年輕一輩中已稍有名聲的詩人。

<sup>34</sup> 這個卒年是根據宗譜記載，但歐大任的文集卻載他在 1593 年得知朱多煃去世的噩耗。

<sup>35</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 777。錢希言到南昌時，朱多熲已臥病十年之久，見錢希言，《二蕭篇》(收入錢希言，《松樞十九山》，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序刊本)，〈答贈宗良先生湖上見寄二首〉，頁 29。朱多熲也致函說：「不肖傾慕足下文章騷雅之望有年矣。」兩人雖然都在南昌，似未相見。見朱多熲，〈王孫宗良書〉，收入錢希言，《二蕭篇》，附錄，頁 3。

<sup>36</sup> 張位雖有《閒雲館集》傳世，但這本文集多半談政治事務或跟官員、士人的往來信札或序跋，很少提及南昌的詩文社集。喻均的文集所載多是他歸鄉以前事。汪應婁僅 1 卷詩集，而朱鬱儀的文集則未能見。

<sup>37</sup> 妖書案發生於萬曆二十六至三十一年(1598-1603)年間，前後兩次，所以區別為第一次與第二次妖書案。張位捲入第一次妖書案中。

<sup>38</sup> 承霈修，杜友棠、楊兆崧等纂，《(同治)新建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885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清同治十年[1871]刊本影印)，卷 48，〈文苑〉，頁 22。《(光緒)江西通志》作「匡山社、龍光社」，「匡」、「佳」二字相似，應是抄寫或刊刻舛誤。見曾國荃、劉坤一等修，劉繹、趙之謙等纂，《(光緒)江西通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65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光緒七年[1881]刻本影印)，卷 137，頁 40。

佳山社成立不久，另有一批年輕士人成立匡山社，這是繼芙蓉社以後的重要詩社，核心成員共九人，人稱匡山九子，分別是戴九玄(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樊良樞(萬曆三十二年進士)、余槩、張超(萬曆四十四年[1616]武進士)<sup>39</sup>、張儲、余欽燿、胡欽華、李炱、彭坡。<sup>40</sup>根據戴九玄作〈九子詠引〉說：「九子何？社九子也。何社？匡山社也。社何九子？則其合焉者也。何詠？昭合也。何九子？其一自詠也。」<sup>41</sup>顯示他們很有意識以九人為社，以九人為核心成員。

從芙蓉社到匡山社的重大轉變在於宗室角色的變化。芙蓉社由士人與宗室共同主持，匡山九子中則無一人是宗室，儘管仍有一些宗室參與在匡山社的活動中，但主從有別。<sup>42</sup>也因此，芙蓉社的社集在王府的芙蓉園舉行，但匡山社的初始集會處匡山(即廬山)卻在南昌境外，使得不能擅離封地的宗室無法與會。匡山社的核心成員中沒有宗室並非偶然，我們可以參考明末舒曰敬(1558-1636)主編、匡山社成員參與修纂的《皇明豫章詩選》，這本詩選錄匡山社士人及芙蓉社士人如余

<sup>39</sup> 張超是萬曆四十四年(1616)武進士，見舒曰敬，《皇明豫章詩選》(收入《歷代地方詩文總集彙編》，第 282-285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據明崇禎九年[1636]刻本影印)，卷 20，頁 219。另見戴九玄，《匡山社集》(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1635]刻本)，無卷數，〈張玄逸詩序〉，頁 7；胡維霖，《胡維霖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6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江西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璧山吟卷 1，〈乙丑遇張玄逸遊戎于京因思戴大圓有感〉，頁 12。

<sup>40</sup> 萬時華，《溉園二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4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卷 2，〈戴大圓先生全集序〉，頁 1-3。

<sup>41</sup> 戴九玄，《匡山社集》，無卷數，〈九子詠引〉，頁 3。

<sup>42</sup> 朱鬱儀、朱多炤、朱多璽(1541-1589)之子朱謀輝，以及其他宗室，都留下不少參加社集的記錄。前文已提及，朱多璽變姓名為來相如出遊，朱謀輝亦仿其父，而變姓名為來鯤(字子魚)遊歷四方。《匡山社集》中來子魚的名字多次出現。

曰德的詩作，但朱多煃等人的詩作全未入列。將此詩選放在江西詩壇發展史來看，宗室很明顯被邊緣化了。

使宗室從共同主持社集到變成社集的外圍者的原因有二：一是詩風，宗室因始終固守朱多煃以來的復古派的風格(後詳)，而跟匡山社必須跟公安、竟陵競爭的路線有別。公安、竟陵兩派繼復古派而起，但反對復古派的復古主張，萬曆朝前期公安派先盛，如袁宏道在北京主持的葡萄社便頗為人所熟知，但萬曆三十六年(1608)袁宏道(1568-1608)去世後，公安派漸步入衰微期，而竟陵派的流行則是萬曆末年左右的事。<sup>43</sup>當時不少江西士人都深受公安、竟陵流風的影響。<sup>44</sup>明末陳弘緒(1597-1665)總述江西詩社，前期舉芙蓉社，這是復古派的詩社，後期舉匡山社，便已必須正視公安派的流風，陳弘緒說：

豫章之詩，當王、李時，芙蓉社稱盛；已再盛於匡山社，則公安諸袁爭雄長焉。<sup>45</sup>

另一點則跟江西的制藝風潮的興起有關，江西的制藝風潮約起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左右，該年陳際泰等人成立紫雲社，這是撫州當地最重要的制藝文社，許多制藝名家都從此社出，此後的撫州以外各地亦陸續成立大大小小的制藝文社，直到萬曆四十三年(1615)豫章社成立時達於極盛，而此制藝風潮正是造成士人與宗室分道揚鑣的關鍵因素。芙蓉社時期，士人僅將制藝視為取得功名晉身的工具，詩與制藝，

<sup>43</sup> 參見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233-281。

<sup>44</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中有關於鄧渼(1569-1628)的軼事，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頁645。鄧渼，字遠游，號壺邱，江西新城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詩文傾向復古派，錢謙益不喜公安、竟陵，所以《列朝詩集》所收錄的江西詩人止於鄧渼，應即跟萬曆晚期江西的楚風日盛有關。

<sup>45</sup> 陳弘緒，《恒山存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陳政刻本影印)，卷2，〈朱萬合刻詩序〉，頁9。

雖不是非此即彼，但有主從之別，亦即以作詩為主，制藝只是餘事。所以有關芙蓉社的記載中，幾乎很少談到制藝，尤其作為核心成員的宗室，因不能應科舉，更是絕口不提制藝。相較之下，同樣也是詩社的匡山社，除了吟詠作詩以外，成員間的交流則常涉及制藝，<sup>46</sup>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戴九玄任官浙江期間出版制藝文稿，而讓兼具心學家與制藝名家雙重身分的陶望齡(1562-1609)為其作序，序文中說——「今之經義，猶古之詩歌也，其盛衰皆足以觀世。」<sup>47</sup>給予制藝高度評價。在《匡山社集》中戴九玄為友人的制藝文稿作引，<sup>48</sup>顯示他們有可能還在社集中討論制藝。隨著明末江西制藝風潮的流行，制藝更凌駕於詩作之上，而成為主軸所在。制藝為主，而詩作只成附屬，亦即制藝才是主旋律，詩作只成了小調。

當士人的立場日益往制藝移動之際，宗室的角色也有調整。在芙蓉社時期，士人與宗室共同主持詩社，而當士人轉向制藝，詩與制藝的主從地位互換時，不必學習制藝的宗室將如何應對此一局面？以下有必要分成兩條線討論，一是宗室與詩社活動，一是明末士人與制藝文社的發展。此處先談宗室。

<sup>46</sup> 匡山九子中雖無宗室，卻有武將張超(字玄逸)，他不必參與科舉的制藝考試，而名列九子則純因其詩作，見戴九玄，《匡山社集》，無卷數，〈張玄逸詩序〉，頁 7。

<sup>47</sup> 陶望齡，〈戴大圓制義序〉，收入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彙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0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325，頁 13-14。

<sup>48</sup> 戴九玄，《匡山社集》，無卷數，〈李元甫制義引〉，頁 3。

### 三、江西南昌宗室與社集活動<sup>49</sup>

#### (一) 以朱鬱儀為首的江西宗室

明代江西藩王主要有三系，分別是南昌的寧藩王系、鄱陽的淮藩王系，以及南城的益藩王系。由於寧藩王系跟文藝與士人社集的關係較深，所以本文只談寧藩王系。

寧藩王系有弋陽王府、建安王府、樂安王府，以及臨川王府、宜春王府、鍾陵王府、瑞昌王府、石城王府，<sup>50</sup>都在南昌縣境內。自從正德年間(1506-1521)宸濠叛亂，寧王府除國以後，則由弋陽王朱拱樞(?-1551)總理八王府事。朱拱樞的《東樂軒詩集》記載他與許多宗室兄弟及地方官員的往來資料。嘉靖年間(1522-1566)，改由弋陽、建安、樂安三王府分管各宗，臨川、宜春兩王府附弋陽之下，鍾陵王府附建安，石城、瑞昌兩

<sup>49</sup> 有關明代藩王的研究，目前已有一些碩士論文是從藩王與地方社會的角度入手討論，而所選擇的是河南、湖廣、陝西、江西等地。梁曼容，〈明代藩王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文，2016)，與呂雙，〈地方上的天潢貴胄——明代山西宗室的生存策略與演變〉(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7)，則是較少數以藩王為題的博士論文，梁曼容整體分析宗藩制度與藩王的政治角色，呂雙則是從生存策略的角度切入談山西宗藩幾代的發展。由於迄今已有不少藩王的墓葬發掘，所以也有一些相關的論文及展覽圖錄。此外，也有一些對藩王的著書、刻書的研究。不過，近年來最受矚目的仍推 Craig Clunas, *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該書選擇山西與湖廣兩地的藩王，藉由檢視他們的文化品味與取向，討論作為 great court 的一部分的藩王與文人士大夫、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交集互動，並進一步檢視明代的政治文化特質。

<sup>50</sup> 曾國荃、劉坤一等修，劉繹、趙之謙等纂，《(光緒)江西通志》，卷 114，頁 9。瑞昌、石城兩王府，是據《盱眙朱氏八支宗譜》所加。

王府附樂安。萬曆五年(1577)弋陽絕封，但仍由宗室代管府事。<sup>51</sup>

江西寧藩王系有《盱眙朱氏八支宗譜》，翻檢此份宗譜可知歷代寧藩各府事。宸濠之亂對八支宗室是一大傷害，不少人都被此事牽連所累。<sup>52</sup>但很快的，嘉靖朝的大禮議，有拱字輩宗室因議禮稱旨而得到褒獎。<sup>53</sup>拱字輩以下的多字、謀字輩更出現不少知名之士。為了方便說明，依王府及字輩，將各王府的知名王孫作條列，請見附表 1-4。從拱、多字輩到謀、統字輩，正好反映明中到晚期江西宗室的發展。

拱字輩有拱樞以詩文著稱，朱多煃、朱多熿、朱多熺這一輩則與余曰德共結芙蓉社。待張位成立佳山社時，多字輩的宗室多半已卒或老病，於是謀字輩的朱鬱儀繼之而起。朱鬱儀以博學著稱。宗室的詩作因受到復古派流風的影響，而復古派宣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詩、文都從模擬入手，無論詩或文的模擬，都須具備對秦漢或盛唐的知識，加上在復古的風潮下，各類典籍如諸子百家之書相繼問世或流行，也考驗作者的博學程度，於是朱鬱儀以其經史博學及其豐富著作成為這一輩宗室的領袖人物。不僅如此，朱鬱儀在士人群體間也擁有很高的聲望，如清初周亮工(1612-1672)曾合刻楊慎(1488-1559)與朱鬱儀的著述目錄。<sup>54</sup>楊慎是被明人譽為博學之最及著述最多者，人稱「明興博雅饒著

51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美國猶他家譜學會拍攝，民國十八年[1929]務本堂本)，卷 1，〈管理八藩王府事鈔〉，頁 5。

52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續稿》，卷 111，文部，〈瑞昌王府三輔國將軍龍沙公暨元配張夫人合葬志銘〉，頁 2。

53 如朱拱柂便是很好的例子，他的父親宸渠，因宸濠事而被逮入京，朱拱柂以身代，三年後方得還鄉。此後他上大禮頌並賜敕褒諭。朱拱權同樣也是「以議禮稱旨，賜敕喻，有聲貴遊間。」朱拱柂事見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 4，〈世系總派〉，頁 32。朱拱權事見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 4，〈世系總派〉，頁 77。

54 周亮工，《詩文補編·楊升菴朱鬱儀兩先生著述目錄》，收入周亮工，《周亮工全集》，第 18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據清康熙周氏賴古堂刻

述者，無如楊升菴先生」，<sup>55</sup>所以能與楊慎並列是很高的推崇。

朱鬱儀享此高名盛譽，所以許多事都圍繞著他在進行，佳山社或匡山社中的宗室便以朱鬱儀為代表。<sup>56</sup>朱鬱儀另在枳園與各地士人共組社集，<sup>57</sup>而當南京舉行金陵大社時，亦以朱鬱儀為中心另結長松社，與其桴鼓相應，可見朱鬱儀除了博學多聞以外，也積極參與在詩社活動中，所以萬曆晚期以朱鬱儀等宗室為首而舉行的龍光社便極具關鍵意義。<sup>58</sup>

## (二) 江西宗室與龍光社

萬曆四十三年有龍光社與豫章社的成立，這是影響明末江西社集發展史的兩件大事。豫章社是制藝文社，後詳。龍光社則是文學性質的社集，以宗室王孫為主角，據載——

南昌郭外有龍光寺，萬曆乙卯(1615)二月豫章詩人結社于斯。宗

本影印)，〈合刻楊朱兩先生著述目錄序〉，頁165。

<sup>55</sup> 焦竑，〈楊升菴先生著書目序〉，收入周亮工，《詩文補編·楊升菴朱鬱儀兩先生著述目錄》，頁167。

<sup>56</sup> 如萬時華所作的〈春日張玄逸竹雪齋，同朱鬱儀、張曼胥、胡實美、戴大圓、李雲將各賦〉，見陳田輯，《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辛籤卷24，「萬時華」條，頁3373；以及戴九玄作〈朱鬱儀、萬茂先同社集玄逸竹雪齋各賦〉(戴九玄，《匡山社集》，無卷數，無頁碼)，可知是匡山社的聚會。

<sup>57</sup> 鄭仲夔，《玉塵新譚》(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子部，第3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刻本影印)，卷2，〈詩雋〉，頁6-8，此處說白社，但白社這個名稱很常見，所以有可能所說的白社就是指長松社。

<sup>58</sup> 歐陽桂，《西山志》(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7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1765]梅谷山房刻本影印)，卷7，〈王孫朱鬱儀墓〉，頁9。

子與者十人，知白之外，則宜春王孫謀、劉文翰，瑞昌王孫謀、雅彥叔，石城王孫謀、壻鬱儀，謀圭禹錫，謀璵誠父，謀塏藩甫，謀塈辟疆，建安王孫謀、穀更生，謀翌禹卿，謀剷緝其詩曰《龍光社草》。郡人都察院右都御史掌工部尚書事徐作汝念、刑部主事張壽朋冲龢序之。<sup>59</sup>

龍光社的規模應不小，《千頃堂書目》指稱「同社者凡四十三人」，<sup>60</sup>可知除了宗室以外，還有 33 名士人與會，儘管我們沒有這些士人的名單，但從徐作（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張壽朋（萬曆十一年進士）兩人的身分來看，推測其中應有不少是士紳。宗室與士紳皆不必應科考，而富貴子弟或不顧慮科考而附庸風雅，所以這類社集發展到後來，很容易流於以宴遊逸樂為主。

隨著朱鬱儀去世，明末宗室所主持的詩社很快變質為士紳及富貴子弟的閒暇樂事，並不令人意外。天啟六年至崇禎元年間（1626-1628）宗室在東湖上賦詩結社，一度引起騷動，以致於南昌知府彭期生（1616-1646）必須出面驅逐一千游伎研仙之輩，彭孫貽（1615-1673）指出：

豫章王孫多工詩，府君（按：彭期生）較士，間及風雅，操觚益盛。  
游伎研仙至豫章，能詩工筆札。王孫紳士結社東湖上，貴游子弟傾動。府君惡其蠱衆，飛檄逐之出境。力持風教又如此。<sup>61</sup>

從「王孫紳士結社」、「貴游子弟傾動」，可以想見這類社集成員多

<sup>59</sup>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9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嘉慶二十四年[1821]扶荔山房刻本影印），卷 1，頁 23。

<sup>60</sup>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31，頁 27。

<sup>61</sup> 彭孫貽，《茗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5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涵芬樓影印海鹽張氏涉園藏手稿刻本寫本影印），卷 23，〈太僕行略〉，頁 16。

是宗室、士紳或富貴子弟。熊文舉(1595-1668)敘述崇禎三年(1630)以前宗室在東湖結社的景象，應也是指同一件事，此時熊文舉只是生員，在湖旁讀書，而未能與會，他說：

往余讀書，寥闊蕭寂，孤行一意，郡中固有紫闌朱門，稱詩極盛，余方俛首耘業，未嘗過而問也。間風日晴美，獨步東西湖上，……郡中是時主詩盟者張魯叟(按：張壽朋)先生，先生固高彭澤五柳之風，而諸宗英雅口西園鄰下之盛。<sup>62</sup>

詩社的「紫闌朱門」，正好跟「俛首耘業」的熊文舉形成對比，而且還有退休士紳張壽朋主盟。張壽朋雖以制藝聞名，但因宦途不遂，所以自我放逐，「慨然以神仙自命」。<sup>63</sup>陳弘緒對宗室結詩社事予以尖銳批評，他說：

當是時，諸王子侯科目未開，不得與有司之試，亦尚未行所謂換授法，率得肆力于學，然大槩資以為詩，詩亦率求工五七言近體而略古體樂府，益無研究於古文詞者，至經史之學尤格格弗置于胸臆。<sup>64</sup>

陳弘緒指宗室因不能應科考而將心思放在詩作，而且選擇近體、忽略古體樂府與古文辭，其實是暗指宗室不好讀書、不講究學問，而僅好吟風弄月、附庸風雅而已。此亦可見當時的年輕士人對宗室結詩社事已傾向負面評價。

宗室主持的詩社變質及中衰的原因有二：一是前文所說的詩壇風

<sup>62</sup> 熊文舉，《雪堂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12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清初刻本影印)，卷 3，〈朱禹卿詩序〉，頁 17-18。

<sup>63</sup> 梁章鉅，《制義叢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1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浙江圖書館臨清咸豐九年[1859]刻本影印)，卷 5，頁 22。

<sup>64</sup> 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敦宿堂留書》，卷 1，〈管理石城王府事鎮國中尉朱公傳〉，頁 28。

氣之變，即從復古轉向公安、竟陵，但江西宗室仍未脫離上一代朱多煃、朱多熡等人的路數，而始終傾向復古派，所以處境日益困窘，如陳弘緒指出：

朱多煃字宗良，亦博雅修詞，與朱多熡齊名，萬曆初諸王孫稱詩，未有不屈指於宗良、用晦者。迨後七子一派，海內群相詆訶，于是案頭有兩君之集者，輒指而揶揄之。<sup>65</sup>

「兩君」即朱多煃、朱多熡，在當時反復古派的流風下，案上若有二人詩集，甚至會受人嘲笑。可以想見仍持復古派路數的宗室子弟，其詩作已難受到當時人的重視。萬曆四十三年成立龍光社時，宗室應已面臨詩壇風氣之變的挑戰，而天啟四年(1624)朱鬱儀的去世，更可視為是宗室為主的社集衰微之徵。

第二，此時士人對待詩社的態度有變。在制藝文社大興以後，士人對詩與制藝的定位有變，變成以制藝為主，而詩作只成附屬。如羅萬藻(?-1647)說——「士大夫往往以全力用之制誥，而以其制誥之餘及詩」，<sup>66</sup>艾南英甚至說——「舉業一塗，遂與詩、古文辭並稱文章」<sup>67</sup>，把制藝視為新文體，並參考古文辭的寫作技巧，以積極開發這個新文體的各種可能性。陳弘緒與傅占衡(1606-1660)二人的評論也

<sup>65</sup> 陳弘緒，《江城名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2，頁 50-51，「芙蓉園」條。

<sup>66</sup> 羅萬藻，《此觀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92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躍齋刻本影印)，卷 3，〈崖西詩序〉，頁 3。此處羅萬藻雖說是「入明以來」的士大夫便已以全力用之制誥，但衡量其上下文，其實仍是晚明末以後方始如此。

<sup>67</sup> 艾南英，《天傭子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卷 1，〈辛未房稿選序〉，頁 15。

有類似的意思，陳弘緒說：

八股學問，聰明之會也，三百年人主玉帛在是，即人才川嶽亦在是，故辛亥(按：萬曆三十九年，1611)以來，八股未窺而能詩古文者，鮮矣。<sup>68</sup>

傅占衡則說：

賦比興風雅頌，此詩人六義，特時文中一體耳，古文亦然，奈何薄八股。<sup>69</sup>

陳弘緒，字士業，南昌人，傅占衡，字平叔，臨川人，二人分別是明末南昌、臨川一帶的年輕士人領袖，而兩地也是明末江西制藝文社最發達的地區，所以二人的評論頗具代表性。陳弘緒說人才須從制藝中出，而未窺制藝則不能精擅詩古文辭。傅占衡則把詩的六義——賦比興風雅頌，說成只是制藝的一體而已。也因此，在此制藝風潮下，有些人只作制藝而不作詩，<sup>70</sup>有些人更刻意跟詩社疏遠，如艾南英說：

吾不作詩，亦不談詩。今人皆耻不如李杜，不耻不如孔孟，抑又何也。<sup>71</sup>

既不作詩，更不會參與詩社。艾南英不是孤例，當時並稱江右四大家

<sup>68</sup> 傅占衡，《湘帆堂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6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活字本刻本影印)，卷 2，〈晁次柳餘艸序〉，頁 5-6。

<sup>69</sup> 傅占衡，《湘帆堂集》，卷 2，〈晁次柳餘艸序〉，頁 5-6。

<sup>70</sup> 如徐世溥(1608-1658)便直言當時江西的幾位制藝作手，包括泰和曾堯臣、泰和劉捷、南昌余正垣雖長於制藝卻不長於詩，他說：「曾、劉、余三子又皆不能詩。詩之溫柔敦厚，非兼夫風流蘊藉者不能當也。」見徐世溥，《榆溪逸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嘉慶刻本影印)，卷 3，〈溉園詩集序〉，頁 6。

<sup>71</sup> 李明睿，〈詩慰序〉，收入陳允衡編，《詩慰》(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5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影印)，卷首，頁 2-3。

的陳際泰、羅萬藻等人，儘管未完全與詩社絕緣，但陳際泰刻意不保存其詩作，<sup>72</sup>羅萬藻自言不知詩亦不敢易言詩，<sup>73</sup>所以陳、羅二人的文集都無詩作，可想而知二人也很少參與在詩社活動中。艾、陳、羅三人在詩與制藝的關係光譜走得較遠，也最具代表性，三人皆重制藝甚於詩作。至於南昌士人在制藝為主而詩作為從的前提下，仍不廢詩作而結詩社，則是大同中的小異，此見第五節。

從陳弘緒所說「八股未窺而能詩古文者鮮矣」，便可以很好理解艾南英對朱鬱儀的評論，艾南英說：

假有人焉，其博無愧於用脩(按：楊慎)，其役使載籍不獨見之於古文辭，而併見之舉子業，使其性靈與其學術相輔而行乎聖賢之旨，則君子於其人宜如何？然自吾求友於天下，始於豫章得王孫鬱儀，鬱儀著書頗宗用脩，然及其所為文，則吾不能不以恨用脩恨鬱儀，而又以王孫故，不得見其長於制藝，則吾尤以為歎。<sup>74</sup>

宗室因不參加科考，所以對制藝寫作極為生疏，博學如朱鬱儀亦不擅長此道，<sup>75</sup>但在「八股未窺而能詩古文辭者鮮矣」的邏輯下，朱鬱儀的詩古文勢必有所不足，所以讓艾南英發出「吾尤以為歎」的感歎。若連朱鬱儀都被質疑，不難想見同時代的其他宗室也受到不小的壓力，因此，天啟二年(1622)開宗科，允許宗室參加科舉考試以後，江西不少宗室紛紛投入科考，如瑞昌王府朱統鑄(1591-1644, 崇禎四年

<sup>72</sup> 李來泰，〈已吾集序〉，收入陳際泰，《已吾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原北平圖書館藏清順治李來泰刻本影印)，卷首，頁6。

<sup>73</sup> 羅萬藻，《此觀堂集》，卷3，〈崖西詩序〉，頁3。

<sup>74</sup>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2，〈朱咸一近藝序〉，頁27。

<sup>75</sup> 但也有不同意見，如陸夢龍(1575-1634)便從科舉妨功立論，以朱鬱儀不必應科考，「無訓詁詞章科舉之習微繞其身，致廣致大，七十年如一日」，而能夠博雅。見陸夢龍，〈朱鬱儀先生傳〉，收入周亮工，《周亮工全集》，頁175。

進士)首登科目，<sup>76</sup>而朱統鑽，與建安王府朱統鉉(1610-1692)亦陸續取得進士功名，<sup>77</sup>至於考取舉人的宗室則更多。也有宗室加入士人的社集，這類社集往往同時兼有詩社與制藝文社的性質。如曾是龍光社成員之一的朱謀翌(1584-1628)便在熊人霖主持的詩社中。<sup>78</sup>朱鬱儀之子朱統鉉入滕王閣社，後來考取崇禎七年(1634)進士。<sup>79</sup>滕王閣社是繼匡山社而起的社集，主要是詩社，也兼有制藝文社的性質，成員都是當時的知名士人。<sup>80</sup>這些宗室的言行以及考取功名以後的任官表現，跟一般士人幾乎沒有兩樣，也可以說，這些宗室都土人化了。

#### 四、江右四大家與明末江西制藝風潮之興：以豫章社為關鍵

回到士人這條線。從萬曆朝的芙蓉社、匡山社等詩社，到制藝文社凌駕其上成為主流，是逐漸演變而成的，而制藝風潮也是一波波疊興而起。明代科舉不考詩文詞賦，而改考四書、五經的經義，此經義文的文體即通稱的制藝或八股文。明初對格式程法的要求尚不嚴格，

76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5，瑞昌統字派，頁28-29。

77 謝旻等監修，陶成等編纂，《(康熙)江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3-51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70，頁41；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5，建安統字派，頁8。

78 熊人霖，《南榮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十六年[1643]刊本)，《文選》，卷17，〈朱洪遠詩引〉，頁7-8。

79 《明詩紀事》有收錄其詩作〈滕王閣留別同社〉，見陳田輯，《明詩紀事》，甲籤卷2下，「朱統鉉」條，頁78-79。彭孫貽，《茗齋集》，卷23，〈太僕行略〉，頁16。

80 萬時華，《溉園二集》，卷2，〈戴大圓先生全集序〉，頁3。

制藝往往不為格式程法所限，作者直述經義，文風樸拙古茂。直到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兩朝方才奠定制藝的寫作格式，其中尤以王鏊(1450-1524)為關鍵，他不把制藝當作經籍的註解，而將其視為載道的文章，<sup>81</sup>讓制藝具有作為新文體的條件。所以俞長城把王鏊比擬如《史記》、杜詩或右軍書之類的典範。<sup>82</sup>王鏊以外，錢福(1461-1504)、唐順之(1507-1560)、瞿景淳(1507-1569)亦嘗試制藝文體的各種可能，與王鏊並稱四大家，後來去錢福而代以薛應旂(1500-1574)，改稱王薛唐瞿。

萬曆中晚期有元脈派的聲勢最盛。<sup>83</sup>所謂元脈派(或另稱法脈派、機法派)並不真有一派，此派主要訴求是取前人作品，尤其歷科會元的文章揣摩其機法，依所揣摩的機法寫作制藝。<sup>84</sup>如王鏊、唐順之兩人是會元出身，他們的文章便常成為士人取法的對象。<sup>85</sup>清初王步青(1672-1751)就以「專尚員機，日趨軟調」批評此流風，他說：

壬辰(萬曆廿年，1592)以降，專尚員機，日趨軟調，垂三十年，氣萎體敗，雖有貞父(按：黃汝亨)、孟旋(按：方應祥)諸公標持風格，

<sup>81</sup> 孔慶茂，《八股文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87。

<sup>82</sup> 俞長城，《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卷4，〈王守裕稿〉，頁16。

<sup>83</sup> 鄭鄧，《峯陽草堂詩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2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一年[1932]活字本影印)，卷7，〈湯霍林〉，頁15。

<sup>84</sup> 關於元脈派的介紹，請見龔篤清，《明代八股文史》(長沙：岳麓書社，2015)，頁372-377；孔慶茂，《八股文史》，頁184-190。

<sup>85</sup> 如賀貽孫(1605-1688)說：「成弘以來，文運昌明，士習端恪，王、唐諸君子之文，春容爾雅，號為元脉。」見賀貽孫，《水田居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08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至同治間賜書樓刻水田居全集本影印)，卷3，〈徐巨源制義序〉，頁112。萬曆年間董其昌作為元脈派的大家，更發明「九字訣」——賓、轉、反、斡、代、翻、脫、擒、離，以概括制藝寫作上的九個機法。以上參考孔慶茂，《八股文史》，頁184-199。

力不足起衰。<sup>86</sup>

「垂三十年」所指從萬曆廿年到天啟二年止，此正是元脈派的流行期，<sup>87</sup>浙江黃汝亨(1558-1626)、方應祥(1561-1628)起而抗衡，<sup>88</sup>但反擊的力道有限，真正能夠撥動新風氣的則是以江右四大家——陳際泰、章世純(1575-1644)、羅萬藻、艾南英為首的江西派。

明末江西制藝風潮以撫州、南昌、吉安三地為盛，江右四大家所在的撫州(尤其是臨川)是中心所在，而南昌與吉安兩地亦各自有其特色。吉安是理學淵藪，陽明心學特盛，所以此處暫不深論。南昌則在制藝風潮的大同中仍持小異，此詳第五節。以下先談江右四大家如何在制藝風潮下，一步步聯繫江西各地士人，彼此形成較緊密的聯繫，於是有了豫章派或江西派之稱。

撫州的制藝文社可上溯到萬曆廿八年(1600)庚子，當時江西各地的制藝文社極少，陳際泰以「五指詛之」來形容——

憶余庚子之役，既罷歸，因邀全人為社。……蓋海內之社比於此者，未始頓五指而詛之也。<sup>89</sup>

<sup>86</sup> 王步青，《已山先生別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73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敦復堂刻本影印)，卷 2，〈題程墨所見集三〉，頁 5。

<sup>87</sup> 壬辰年(1592)的會元吳默(1554-1640)是受到陶望齡的奇矯文風的影響，接著乙未年(萬曆二十三年，1595)有湯賓尹(1568-?)為會元，此後湯賓尹主導制藝文壇風氣二十餘年。

<sup>88</sup> 如艾南英所說：「自萬曆之季，房稿盛行，而天下無制藝，學者莫不勦襲浮艷以欺奪主司，孟旋先生毅然以斯文為己任，而天下始知以通經學古為高。」見艾南英，《天傭子集》，卷 2，〈青來閣二集序〉，頁 43-44。

<sup>89</sup> 陳際泰，《大乙山房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6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據明崇禎六年[1633]刻本影印)，卷 4，〈新城大社序〉，頁 21。該集名應作「大乙」，而世訛作「太乙」，陳際泰之婿鄭邑雋頗為痛心說：「先生《大乙山房集》，世訛為太乙者，已行天下三十年矣。」見

成立此社的原因，則跟制藝風氣敗壞有關，他說：

庚子以來，文章氣靡而理膚，習而溺之者，以為固然，而以聖賢之規旨與秦漢以逮成弘之義類繩之，初不知為何物。二三兄弟憂焉，故起而為典則之文以矯之，使氣疏而勁，理明而確。<sup>90</sup>

社集場所位於撫州府的臨川、金谿兩縣交界處的紫雲寺，所以稱作紫雲社。該社吸引兩縣的士人參與，而以來自臨川的士人為多，<sup>91</sup>成員包括陳際泰、章世純、羅萬藻、祝徽(1568-1634)、丘兆麟(1572-1629)、游王廷(萬曆四十四年進士)、蔡國用(1579-1640)、管天躍(字)、曾棟(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兄弟四人。同一時期另有汝南騰茂社，據陳際泰所述，「社業自分兩家」，「其雅則命體不失沖氣者，而管龍躍、傅友梅為首；其玄則開宗奇矯自絕者，而陳大士為首」。<sup>92</sup>由於管、陳二人都在紫雲社中，加上兩社成立的時間點差不多，所以有可能是以原班人馬為主幹另外成立汝南騰茂社。兩社有不少人先後得第而颺去，<sup>93</sup>因此明末江右制藝社集之興，可以說是從紫雲社這個地方社集開始。<sup>94</sup>

此後各地制藝文社興起，且進一步形成跨地域的大社，如陳弘緒說：

萬曆末，乃有合海內英俊而稱大社者。齊魯燕趙吳楚巴蜀，不

鄭邑雋，〈己吾集敘〉，見陳際泰，《己吾集》，卷首，頁1

90 陳際泰，《大乙山房文集》，卷6，〈豫章文正二集序〉，頁4。

91 陳際泰，《己吾集》，卷3，〈曾叔子合刻序〉，頁7。

92 羅萬藻，《此觀堂集》，卷4，〈汝南明業社序〉，頁32-33。

93 陳孝逸，《癡山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4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卷1，〈府君行述〉，頁11。艾南英當時不在前兩社中，見艾南英，《天傭子集》，卷首，《年譜》，丙午年。

94 此後江西各地紛紛成立制藝文社，如瑞金便有赤水社，見蔣方增纂修，《(道光)瑞金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第81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據清道光二年[1822]刻本影印)，卷7，頁5。

謀而通置郵，鴻篇巨牘，浩汗陸離，用以表王者之無外。嗚呼，抑亦二百餘年之盛也。<sup>95</sup>

豫章社即其中最著名者。

萬曆四十三年的豫章社是明末江西最重要的大社，當年是鄉試年，許多士人聚集南昌，江西布政使李長庚(?-1644)遂合江西各地士人於一處舉行社集，經過如下：

太守宰李長庚任江西左布政，其子春潮才而好奇，合豫章諸能文者為豫章社，臨川則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東鄉則艾南英，泰和則蕭士瑋、曾大奇，吉水則劉同升，南城則鄧仲驥，豐城則楊惟休、李良，進賢則陳維謙、李光倬、陳維恭，皆郡邑間最馳聲者，而南昌、新建首時華與萬曰佳、喻全祀，時華尤為所推服。<sup>96</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以豫章社是艾南英、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等四人主導成立，應誤。<sup>97</sup>豫章社成員雖僅十餘人，但這十餘人是來自江西各地的領袖人物，於是藉此社集而讓各地士人有密切來往與聯繫的機會。<sup>98</sup>能入豫章社的士人基本上都已頗有文名，<sup>99</sup>主要分作三

<sup>95</sup> 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敦宿堂留書》，卷2，〈成社序〉，頁39-40。

<sup>96</sup> 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敦宿堂留書》，卷1，〈先友祀鄉賢萬徵君傳〉，頁39。

<sup>97</sup> 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38，子部，頁26。

<sup>98</sup> 儲大文，《存硯樓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乾隆十九年[1754]儲氏家刻本影印)，卷5，〈孟春復集時習堂序〉，頁23。

<sup>99</sup> 李光元(?-1633)不在名單中則頗不可解，他是萬曆三十五年進士，但不久以病歸養，直到萬曆四十八年方才再出，可知此時他人在江西，但卻未參加這類社集活動，僅素常與其師友唱和的從弟李光倬與會。李光元與李光倬的關係，見朱楣等修，賀熙齡等纂，《(同治)進賢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第59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據

批：一批是萬時華、李寔(嘉靖四十一年進士)、陳維恭、李光倬等人，來自南昌府；一批是臨川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艾南英等人，來自撫州府；第三批則是來自吉安府，包括蕭士瑋(天啟二年進士)、曾大奇與劉同升(1587-1645)等人。會後，則由南昌萬時華與李寔二人主編，完成《豫章社選》一書。

南昌當地另有一批名未大起的年輕士人，以陳弘緒與熊人霖為首，在張位的故居杏花樓舉行社集。<sup>100</sup>這批年輕士人雖未得入豫章社，但仍可以與該社成員往來論交，<sup>101</sup>遂使其眼界一時開闊。<sup>102</sup>這批年輕士人較親近的是江右四大家，所以當《豫章社選》刊刻出版時，陳弘緒說：

適雲將(按：李寔)、茂先(按：萬時華)《豫章社選》成，諸兄弟盛推  
臨汝之學。<sup>103</sup>

此處的「諸兄弟」應指杏花樓社中的年輕士人，他們雖未參與豫章社，但藉《豫章社選》評價江西各地制藝水準，從「諸兄弟盛推臨汝之學」，可見南昌年輕士人對江右四大家頗為推崇。臨川的陳際泰、艾南英等人亦與這批年輕士人結識往來：萬曆四十六年，該年也是鄉試年，陳際泰與合稱南州四子的余正垣(余曰德之孫)、李奇(李遷曾孫)、劉斯陞、鄧履中(鄧以讚從子)握手訂交。<sup>104</sup>艾南英亦然，他不僅與四人及陳弘緒等人訂交，<sup>105</sup>同時也與徐世溥結為異姓兄弟，徐世溥正是與陳弘緒齊名

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影印)，卷 19，頁 25。

100 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石莊初集》，卷 5，〈曾堯臣文序〉，頁 3。

101 見萬時華，《溉園二集》，卷 1，〈曾堯臣合稿序〉，頁 5；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石莊初集》，卷 5，〈曾堯臣文序〉，頁 3。

102 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石莊初集》，卷 5，〈曾堯臣文序〉，頁 3。

103 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石莊初集》，卷 5，〈曾堯臣文序〉，頁 3。

104 陳際泰，《大乙山房文集》，卷 6，〈余小星小引〉，頁 46。

105 天啟五年(1625)，艾南英作〈四子合刻序〉，所以較諸陳際泰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識得四子晚了七年左右的時間。四子即劉斯陞、鄧履中、余正

者。<sup>106</sup>陳際泰、艾南英與南昌年輕士人的訂交，顯示撫州的勢力滲入南昌，取得年輕士人的信從。

這批年輕士人彼此間也結為異姓兄弟，<sup>107</sup>而且在天啟年間成立葵社，共四十幾位社員，<sup>108</sup>顯示這些人已可主導南昌當地文風。由於年輩上的差距，加上陳、艾等人成名較早，所以這批年輕士人隱然以陳、艾等人為首。陳弘緒在前引文中說「余社中兄弟好為高古之言」，顯示他們以此作為文章風格的標準所在，而此標準應是受到江右四大家，尤其是艾南英的影響。艾南英以通經學古稱之，說：

向者吾鄉一二同人以通經學古挽回斯道。<sup>109</sup>

舉業至萬曆之季，卑陋極矣，自四家之文出，而天下知以通經學古為高。<sup>110</sup>

此段文字是艾南英在崇禎三年為《四家合作摘謬》所作序。四大家之文自萬曆中晚期以後便已流傳於人手之間，先後有《四家合作》與《四家合作糾謬》的刊行，兩書都對當時的文風影響頗大。通經學古是明

---

垣、李奇。艾南英先識萬時華、李雲將、喻仲延等人於豫章社。此後又識劉、鄧、余、李與陳弘緒等人。見艾南英，《天傭子集》，卷2，〈四子合刻序〉，頁57-58。

<sup>106</sup> 如清初王士禛便說陳弘緒、徐世溥二人是「南州眉目」。見王士禛，《居易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1，頁25；又見徐世溥，《榆溪逸稿》，卷首，〈名公評語〉，頁1。

<sup>107</sup> 南州四子，加上萬曰佳(美叔)之子萬搏(風后)，結為異姓兄弟，見徐世溥，《榆溪逸稿》，卷6，〈南州四子合傳〉，頁8-9。

<sup>108</sup> 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敦宿堂留書》，卷2，〈誠社序〉，頁11。張溥亦為其社選作序，見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8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崇禎九年[1636]刻本影印)，文集存稿，卷5，〈黎左嚴稿序〉，頁9-10。

<sup>109</sup>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3，〈吳逢因近藝序〉，頁8。

<sup>110</sup>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3，〈四家合作摘謬序〉，頁40。

末的流行語，標榜回歸經學本位的取向，此風由江右四大家倡導於前，復社群體緊隨於後，而兩方對通經學古的主張，在方向一致，而細節有別。江西派傾向在制藝寫作中引用儒經或先秦兩漢典籍的內容，而循此而作的制藝便被視為是高古文風。如陳弘緒所說——「遇有雄奇高古之作，輒曰：是江右派」。<sup>111</sup>

最後必須指出：明末江西不會只有一種文風，只是四大家所標榜的通經學古之風被陳弘緒等人視為主流的文風。

## 五、大同中的小異：萬時華及南昌的詩社

在制藝風潮的主旋律下，明末南昌仍持續有詩社成立，這跟南昌的地域特色有關，南昌的詩風較盛，從芙蓉社、匡山社，以及宗室主持的龍光社都在南昌舉行。南昌士人群體中以萬時華的年紀較長，是與江右四大家同輩的人物，而當時也頗為活躍的陳弘緒、徐世溥、熊人霖等人則稍晚一輩，所以除了江右四大家以外，萬時華亦隱然為南昌士人群體的領袖，如崇禎九年鄉試前夕，便以萬時華為首，呼集 172 名士人共同結盟。江右四大家專擅制藝，而萬時華的制藝與詩則皆自成一格，<sup>112</sup>徐世溥說：

豫章以古學倡天下者三十年于茲，然初時率用以攻勦時文，惟  
艾千子力步廬陵，萬茂先要歸麗則，士業(按：陳弘緒)出而沛然以  
浩氣達辭，王長其間，于是天下始明目正聽，復睹所謂大家之真  
古文者。<sup>113</sup>

<sup>111</sup> 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石莊初集》，卷 4，〈甲戌房稿辨體序〉，頁 9-10。

<sup>112</sup> 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敦宿堂留書》，卷 1，〈先友祀鄉賢萬徵君傳〉，頁 41：「(萬)時華以制義、以詩、以古文名海內幾四十年。」

<sup>113</sup> 徐世溥，《榆溪逸稟》，卷 4，〈鴻鵠集序〉，頁 11。

徐世溥把萬時華的文風歸於楊維楨(1296-1370)一路，楊維楨作《麗則遺音》一書，而四庫館臣的評價是——「維楨才力富健，回飄馳霆激之氣，以就有司之繩尺，格律不更，而神采迥異。遽擬諸詩人之賦，雖未易言，然在科舉之文，亦可云卷舒風雲、吐納珠玉者矣。」<sup>114</sup>徐世溥之意，應即萬時華將其古學之才力用於制藝，而仍可成一家言。

萬時華亦以詩名，他的詩作得到錢謙益的讚譽，<sup>115</sup>而且他將詩作與《詩經》的詩義合一看待，亦即將詩與制藝等同齊觀，並頗以南昌的詩作與詩義成就自豪，說：「今世治詩，吾南州與吳之海虞、越之慈谿，鼎足而望。」<sup>116</sup>姑且不論他所論的鼎足而望是否符合實情，但可知當時南昌士人頗自謂在詩作有獨到之功。

明末南昌比較重要的詩社分別有南州大社(應即南州詩社)、東湖社，與滕王閣社。南州詩社是由李寅、萬時華與喻全祀，加上萬曰佳所主導，四人正是萬曆四十三年豫章社的南昌士人領袖。<sup>117</sup>今亦參與詩社，加上陳際泰、羅中魯(字)、<sup>118</sup>葉當時(字)、熊人霖、李奇，以及陳際泰的門人喻成憲、南昌梓溪劉氏的劉一煜(字未央，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劉斯琦(字不踰)、劉斯瑋(字西佩)等人。<sup>119</sup>

<sup>114</sup> 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68，集部 21，別集類 21，頁 52-53。

<sup>115</sup>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愛琴館評選詩慰序〉，頁 714。

<sup>116</sup> 萬時華，《溉園二集》，卷 3，〈二劉詩義合刻序〉，頁 16，新編頁 376。

<sup>117</sup> 承霽修，杜友棠、楊兆崧等纂，《(同治)新建縣志》，卷 50，頁 21。可知萬曰佳與萬時華的關係密切，其子萬搏，則是與劉斯陛、李奇、余正垣、鄧履中為異姓兄弟。見徐世溥，《榆溪逸稿》，卷 6，〈南州四子合傳〉，頁 8-11。

<sup>118</sup> 羅中魯(字)來自理學陣營，他是朱試的得意弟子，見文德翼，《求是堂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4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末刻本影印)，卷 15，〈東李文學同人書〉，頁 28。

<sup>119</sup> 陳際泰，《大乙山房文集》，卷 4，〈南州大社〉，頁 14；萬時華，《溉

崇禎元年，李寅卒；崇禎四年，萬曰佳卒。<sup>120</sup>崇禎五年(1632)遂以萬時華、熊人霖為首在東湖舉行詩社，<sup>121</sup>萬元吉、朱徽也在社中。<sup>122</sup>萬時華記載道：

余十年友熊伯甘(按：熊人霖)。戊午(1618)黃貞父先生(按：黃汝亨)首  
伯甘童子中，……余時讀其文，已心折之。已國中社事日盛，  
群引伯甘為重，余遂得以文事從伯甘。近諸君子稱詩湖上，曰  
東湖社，余又得從伯甘以詩。<sup>123</sup>

崇禎五年年初竟陵派譚元春(1586-1637)過訪南昌，並盤桓兩個月之久，便與東湖詩社社員往來。<sup>124</sup>雙方關係很密切，如陳弘緒所述——

友夏涉彭蠡，寓鐵柱觀，與諸子祖跣大叫，呼盧轟飲，暇輒持  
《鵠灣吟稿》索評讐。記其公車東予云：「悔不南而北，南可  
以見吾士業(按：陳弘緒)、士雲(按：劉斯陛)，北徒北耳。」復出所  
未刻詩索評讐如往昔，為手錄其可傳者。<sup>125</sup>

譚元春嘆「不南而北」、「北徒北耳」，充分流露他與陳弘緒、劉斯

園二集》，卷2，〈益社序〉，頁33。

120 萬時華，《溉園初集》，卷1，〈祭美叔十叔文〉，頁24-25。

121 熊人霖，《南榮集》，《詩選》，卷首，〈南榮詩選敘〉，頁2。

122 熊文舉，《雪堂先生文集》，卷2，〈萬吉人、朱子美、陳士業、萬茂先  
諸君子鳩社於東西湖上，虛席遲予書來酬和〉，頁25。

123 萬時華，《溉園初集》，卷2，〈綠雪樓制義序〉頁42。

124 根據相關資料，可知譚元春入豫章，因萬時華、陳弘緒言熊人霖長於樂府、  
五言古詩，而識熊人霖。見熊人霖，《南榮集》，《詩選》，卷首，〈南  
榮詩選敘〉，頁2；譚元春，〈操漫草引〉，收入熊人霖，《南榮集》，  
《詩選》，卷首，頁1。熊人霖與譚元春論詩龍沙，見熊人霖，《南榮集》，  
《文選》，卷11，〈評箋唐詩選敘〉，頁36-37。此外，當時正逢徐世溥  
自金陵歸，喻全祀招往湖上三洲亭，於是連同譚元春、陳際泰、萬時華及  
其弟萬時升、喻全祀之子喻周共七人詩會，各成五古一首。見徐世溥，《榆  
溪逸稟》，卷3，〈三洲唱和詩序〉，頁18。

125 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寒崖近稿》，卷1，〈詩慰序〉，頁1。

陞這兩位年輕一輩士人相見恨晚之意。值得注意的是，以制藝見長而少有詩作的陳際泰，竟也出現在某次三洲與譚元春的聚會中，並作五言詩六句。<sup>126</sup>

緊接著崇禎七或八年(1634、1635)左右舉行滕王閣社，此社亦以萬時華為首，明白揭示是繼匡山社而起，所以萬時華說「吾屬方尋滕閣之盟，以紹九子」。<sup>127</sup>與會者共 14 人，確知成員包括萬時華、陳弘緒，朱健與朱徽(崇禎四年進士)兄弟，萬元吉(1603-1646)與萬六吉兄弟等人，以及梓溪劉氏的劉一煜、劉斯琦、劉斯璋等人，<sup>128</sup>熊人霖應也在會中。<sup>129</sup>

此時的詩社已跟芙蓉社或甚至匡山社稍有不同，這個時期的詩社成員跟制藝文社的成員幾乎重疊，而且這種重疊並非偶然。在復古派的詩社中，人們對制藝的定位是工具性的，或是模稜兩可的，所以極少討論到詩與制藝的關係。此時則不然，制藝文社中的士人，對制藝多給予正面價值，而同一批士人又在詩社，則自然會討論詩與制藝的關係。前引陳弘緒與傅占衡的兩段話，顯示明末江西士人普遍認為即使是詩古文的寫作，也不能捨制藝不理，甚至必須結合制藝，方才算是能詩古文者。這是大方向，而在此大方向下，撫州以江右四大家為代表，重制藝而輕詩作，南昌士人則試圖稍偏向詩作一點，儘管仍以制藝為主，但亦不廢詩作，所以熊人霖說：

明興，經義取士。當崇禎初服，文士號稱極盛，非以古文為今文，而兼能詩能古文者不名，若吾里茂先、士業、巨源三徵君

126 徐世溥，《榆溪逸稿》，卷 3，〈三洲唱和詩序〉，頁 18。

127 萬時華，《溉園二集》，卷 2，〈戴大圓先生全集序〉，頁 3。

128 萬時華，《溉園二集》，卷 2，〈益社序〉，頁 32。

129 朱徽、萬元吉，常出示所作詩予萬時華、陳弘緒及熊人霖幾人評誦，可知熊人霖應也在社中。見萬時華，《溉園二集》，卷 2，〈朱萬合刻詩序〉，頁 8。

其選也。<sup>130</sup>

又說：

其時為舉業者不為詩古文則不名，詩古文侵于舉業，若客星守犯則不售。<sup>131</sup>

今文即制藝，三徵君即萬時華、陳弘緒、徐世溥，加上熊人霖本人，正是南昌士人群體的代表人物。幾人既是制藝作手，又雅擅詩古文，所以熊人霖以幾人為例，強調不能兼擅制藝與詩古文者難以成名。徐世溥也指出：

士大夫能詩賦而不達經學，則近于山人；通經學而不能吟咏，則近于腐儒；吟咏而無經濟，則近于婦人。<sup>132</sup>

此處的經學，應指制藝而言，因制藝是解經的經義之學。徐世溥的言下之意，即必須兼擅制藝與詩文，才有經世濟民的可能。

由於制藝是以古文為今文，理想上，習制藝便不能不習古文，所以熊人霖的兩段話雖都說「詩古文」，但其關鍵詞不在古文而在詩。熊人霖、徐世溥都在南昌的詩人群體中，所以兩人把詩放到很重要的位置。相對於此，以江右四大家為首的撫州土人不以詩作見長，則未必會走到像熊、徐二人那麼遠。

無論是陳、傅或熊、徐的看法，若是跟明中期復古派把制藝與詩古文截然二分的立場相較，可謂是一大轉變，而明末江西詩社成員同時也在制藝文社中，遂不足為異。

<sup>130</sup> 熊人霖，〈徐巨源徵君傳〉，收入徐世溥，《榆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刻本影印)，卷首，頁 4。

<sup>131</sup> 熊人霖，〈新建徐巨源集選序〉，收入徐世溥，《榆墩集》，卷首，頁 1。

<sup>132</sup> 徐世溥，《榆溪逸稟》，卷 3，〈周易爻物當名序〉，頁 1。

## 六、結語

本文主要討論從詩社到制藝文社的前後代興，以及明末制藝風潮所造成的掀動。首先，過去對明中期文學復古運動江西士人的角色及其社集活動了解不多，藉由本文的討論，可知這波運動主要以南昌為中心而展開。宗室共同主持詩社則是很值得注意的部分，尤其宗室不必參加科考，亦不寫作制藝，所以芙蓉社是純粹的詩社，而沒有制藝寫作的活動。

其次，從芙蓉社到匡山社，則是士人與宗室彼此從合作到分道揚鑣的轉折點。宗室主持龍光社一度引人矚目，但此後在東湖舉行的詩社，卻被視為是宴遊逸樂的無益之事，甚至因為擾亂風氣而受到地方官員的壓抑。

第三，制藝風潮在江西的南昌、撫州與吉安三個區域發展最盛，而以撫州及江右四大家為中心。隨著各地社集活動，以及豫章社等大社的舉行，南昌年輕一輩士人與江右四大家互通聲氣。我們可將此視為是江右四大家的勢力往北擴展及於南昌，最後取得凌駕於其他士人之上的地位。

第四，相對於宗室主持的詩社被批評，同時期南昌士人也有詩社活動，主要以萬時華為首，加上當地年輕士人群體組成。這批詩社成員同時也參與制藝文社，所以此時的詩社性質既跟明中期芙蓉社迥不相同，也跟明末宗室舉行的詩社有別。因為像芙蓉社及宗室詩社這類純粹的詩社，在明末江西發展的空間不大。明末江西士人所推崇的詩作，必須跟制藝有所關聯，像萬時華把詩作與詩義合一看待，就是很好的例子。亦如熊人霖所說，當代士人「非以古文為今文，而兼能詩能古文者不名」、「為舉業者不為詩古文則不名，詩古文侵于舉業，若客星守犯則不售」，即士人必須兼備詩及制藝的能力，而且必須謹

守制藝是主旋律，詩是小調的定位。

江西社集的發展軌跡，必須與同時代的江南地區合看，畢竟江西與江南是明末兩大制藝中心所在，而彼此既交流又競爭，所以不能單獨只看江西而不顧江南。明末江西與江南兩地在制藝上競爭，而且江右四大家曾一度主導風氣。如艾南英說——「戊辰以前，臨川之派盛行」，<sup>133</sup>戊辰是崇禎元年(1628)，亦即從萬曆中期到天啟年間，以江右四大家為首的豫章社盛行一時，但很快的江南起而競爭，先有天啟五年(1625)左右應社成立，崇禎二年，復社成立，並舉行尹山大會，吸引來自四面八方之士的參與。也因此，崇禎二年(1629)艾南英、陳際泰等人編纂出版《豫章文正》選本，大動作標榜江西派的制藝典範，不僅所收錄的都是江西士人的制藝作品，而且要讓海內人「知豫章之文之有正，與夫文必豫章之正而後為正也」。<sup>134</sup>正可視為是在江南競爭下，江西據此以區別而自立一格。

過去較多注意到兩地在制藝主張上的分別，但卻較容易忽略詩作也是了解兩地異同的另一個關鍵。江西與江南兩地詩社的發展頗有別。明末江西以制藝文社為主，詩作只是附屬，甚至不少人不習詩或不談詩。相對的，明末江南幾個具代表性的制藝文社——包括復社、幾社、讀書社，其中幾社與讀書社都同時兼具制藝文社與詩社的性質，而且制藝與詩作之間不易分出主從，亦難說其聲勢流風之高下。明末江南地區既常見制藝文社的集會，各地也有不少詩社的活動，甚至跟方以智(1611-1671)有關的澤社、永社，還從制藝文社變成詩社。<sup>135</sup>

當明朝覆亡以後，士人對制藝的各種講究或追求，一時間都變無用，

133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4，〈吳仲升稿序〉，頁36。

134 陳際泰，《大乙山房文集》，卷6，〈豫章文正二集序〉，頁4-5。

135 見商海鋒，〈澤社、永社、雲龍社——明末桐城「詩文社集」的勃興與頓挫〉，收入張藝曦等編，《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

所以也不再有制藝文社的成立及舉行。此時不少士人轉向詩社，所以清初江南各地可見到詩社的成立，但相形之下，同時期的江西卻顯得十分寂寥，而少見詩社的活動。當江南有吳偉業(1609-1672)主持詩社，江西有清初三山——程山謝文淳(1615-1681)以理學，翠薇山寧都三魏以古文，鬱山宋之盛(1612-1668)以氣節著稱於世，但卻很少有詩社。

這也是本文最後特別注意南昌一帶詩社發展的原因所在。江西從宋代以來便有江西詩派，但這個詩派不為復古派所取，所以王世貞說余曰德是「大江以西一人」，便有否定江西詩派的味道，而認定江西的詩作是從余曰德等人起算，芙蓉社在南昌舉行，後續的匡山社，以及明末萬時華、徐世溥等人主持詩社，雖與芙蓉社沒有直接淵源，但可說都是南昌的地域文化風氣影響使然。明末江西先後有舒曰敬的《皇明豫章詩選》、徐世溥作《友聲》、陳弘緒編《神聽集》、陳允衡纂《詩慰》，這幾本詩選都抱持江西詩壇能夠與江南詩壇爭一雄長的希望，讓江西不必附庸於江南的詩風之下。儘管客觀來說，江西詩壇終難以與江南詩壇相提並論，而從後見之明來看，幾人的希望終究落空，所以清初江西詩壇頗為寂寥，但我們仍不應忽略此條線索。循著這條線索看下去，便可發現清初江西除了謝文淳、寧都九子以外，另有李元鼎(1595-1670)以詩作得名，並且與宋犖(1634-1714)、施閏章(1618-1683)等人往來唱和，則是很值得繼續研究的部分。

(本文於 2019 年 8 月 9 日收稿；2019 年 12 月 25 日通過刊登)

\* 本文是科技部專書寫作計畫的部分成果。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的寶貴意見，以及編委對部份段落的刪改建議，在此一併誌謝。

## 附錄

寧王府有《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傳世，以下表格內的人物記載，大多數採錄自此宗譜，並參考朱謀埠的《藩獻記》、陳田(1850-1922)《明詩紀事》等書。

### 附表1 戲陽王府

弋陽王府在多字輩以後人才輩出，以拱檜這支獨盛，多煌、多炤、多燝、多炤四人皆拱檜之子。

拱字輩	拱檜(1513-1560)，字汝楫，號竹隱，封輔國將軍。 <sup>136</sup> 統攝府事，……嘉靖二十九年薨。子多焜嗣爵，諸郡王始分治。 <sup>137</sup>
多字輩	多煌(1536-?)，字芾斯，號少懸，封奉國將軍。拱檜長子 嘉靖□年奉敕管理弋陽、瑞昌二府事。……著有《委蛇集》二卷 行世。 <sup>138</sup> 與弟炤、燝、炤，皆用文雅結友遍遠近，子弟群從莫不解藝善書。 <sup>139</sup> 多炤(1541-?)，字貞吉，號瀑泉，封奉國將軍。拱檜次子。 與宗人(多)熽、(謀)境、(謀)境等結詞社，久之游道益廣，海內譚

<sup>136</sup>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世系總派〉，頁50-51。

<sup>137</sup> 朱謀埠，《藩獻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19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萬曆刻本影印)，卷2，頁11-12，新編頁761。

<sup>138</sup>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世系總派〉，頁115。

<sup>139</sup> 朱謀埠，《藩獻記》，卷2，頁13，新編頁762。

	<p>藝者莫不知有貞吉。<sup>140</sup>          多熾(1542-1597)，字京甫，號守愚，封奉國將軍。拱檜三子。          公讀書樂道，嗜學好詩，著有《肥遜先生集》行世。<sup>141</sup>          多炤(1546-1619)，字孔陽，號然菴，封奉國將軍。拱檜四子。          公志潔行廉，雅耽詩古，著有《自娛集》行世。<sup>142</sup></p>
謀 字 輩	<p>謀觀(1559-?)，號孔光，封奉國將軍，管理弋陽府事。          少與貞吉公之子謀暉公同肄業，貞吉以詩文之訣，篝燈丙夜，至          翳猶然。著《存存齋詩稿》，舒公曰敬敘，行於世。<sup>143</sup>          謂暉(1559-?)，字圖南，號天池，封鎮國中尉。多熾長子。<sup>144</sup>          詩作與孫一元、其父朱多熾合稱「明宗三逸」。<sup>145</sup></p>

140 朱謀暉，《藩獻記》，卷2，頁15，新編頁763。

141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世系總派〉，頁116。

142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世系總派〉，頁116。

143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弋陽謀字派〉，頁229。

144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弋陽謀字派〉，頁233。

145 陳田輯，《明詩紀事》，第1冊，甲籤卷2下，頁77。

## 附表2 瑞昌王府

瑞昌王府也是自多字輩在文藝上有所成就，而以多熾、多煃、多忻三人為代表。統鑄藏書校讎，凸顯宗室的經濟能力，使其能夠蒐羅古籍而在這波的復古風潮中受到重視。<sup>146</sup>

多字輩	多熾(1530-1591)，字崇良，號貞湖，封鎮國中尉。 <sup>147</sup> 多煃(1534-1596)，字用晦，號斗西，封奉國將軍。 多忻(1536-1599)，號夢江，封鎮國中尉。 <sup>148</sup>
謀字輩	謀雅(1569-1621)，號崑邱，封輔國中尉。多熾四子。 <sup>149</sup> 按：龍光社主要成員之一。
統字輩	統鑄(1561-1636)，號慎學，封鎮國中尉。 <sup>150</sup> 聚書十餘萬卷，手自讎校。鑄撰《古史編年》十卷，尚未行。 <sup>151</sup>

<sup>146</sup> 朱謀偉，《藩獻記》，卷4，頁10-11，新編頁776-777。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中查無多熾。

<sup>147</sup>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瑞昌多字派〉，頁77。

<sup>148</sup>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瑞昌多字派〉，頁76。

<sup>149</sup>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瑞昌謀字派〉，頁164。

<sup>150</sup>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5，〈瑞昌統字派〉，頁15。

<sup>151</sup> 朱謀偉，《藩獻記》，卷4，頁17，新編頁764。

### 附表3 建安王府

自拱樞以來，樂安王府便常與士人往來，所以錢希言、曹學佺來南昌時，也受邀到王府的半隱園作客。<sup>152</sup>多鑾是淨明道教徒，所編纂的《純一玄藻道書》即道教典籍。

拱字輩	<p>拱樞(1513-1583)，號匡南，封輔國將軍。<sup>153</sup></p> <p>善為文，工詩，海內知名。著有《瑞鶴堂詩集》、《爽堂文稿》各二卷。<sup>154</sup></p> <p>按：與朱多煃同時，曾參加芙蓉社。<sup>155</sup>有詩入《明詩紀事》。<sup>156</sup></p>
多字輩	<p>多鑾(1550-1619)，號斗隅，封奉國將軍。</p> <p>著《純一玄藻道書》傳世。<sup>157</sup></p>

<sup>152</sup> 曹學佺，《豫章遊稿》(收入曹學佺，《石倉全集》，第9冊，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內閣文庫藏明刊本)，〈孟秋二日遊宴半隱園三首〉，頁26。

錢希言，《二蕭篇》，卷上，〈建安王半隱園賦有序〉，頁1。

<sup>153</sup>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世系總派〉，頁25。

<sup>154</sup>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瑞昌多字派〉，頁74。

<sup>155</sup> 如朱拱樞與朱多煃、余曰德在章江為友餞別送行，便留下《江門別言》一書。見朱拱樞等著，《江門別言》(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刊本)。朱拱樞自己僅留下一卷詩集，余曰德作序，稱其作詩「自束髮以迄于今垂三十年，未嘗一日輟不為也」。余曰德，〈瑞鶴堂近稿敘〉，收入朱拱樞，《瑞鶴堂近稿》(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無錫俞氏刊本)，卷首，頁3。余曰德的詩集不時提及的「子深宗侯」即拱樞。

<sup>156</sup> 陳田輯，《明詩紀事》，第1冊，甲籤卷2下，頁67。

<sup>157</sup>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建安多字派〉，頁62。

謀字輩	<p>謀壘(1581-1649)，字尚卿，一字禹卿，別號衡岩，封奉國將軍。能為五七言近體，追琢不遺餘力。刻有《深柳居種園譜草》，事行采入《新建縣志》、《南昌府志》。<sup>158</sup></p> <p>按：龍光社主要成員之一。</p> <p>謀殼(1577-1637)，號泰元，一號太元，又號更生。封鎮國中尉。多鬻三子。有詩集載《龍光社草》。<sup>159</sup></p> <p>按：龍光社主要成員之一。</p>
統字輩	<p>統鉉(1610-1692)，字嘉侯，一字無外，號赤山，封輔國中尉。</p> <p>時宗姓不得赴制科，遂棄爵為諸生中式。明崇正丙子科鄉試舉人，明崇正庚辰科進士。<sup>160</sup></p>

158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建安謀字派〉，頁133。

159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建安謀字派〉，頁137。

160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5，〈建安統字派〉，頁8-9。

#### 附表4 石城王府

多字輩	多標(1549-1629)，字知白，號荊山，封輔國將軍。 <sup>161</sup> 按：龍光社主要成員之一。
謀字輩	謀蕡(1566-1642)，號體元，封奉國將軍，管理石城府事。 <sup>162</sup> 按：龍光社主要成員之一。 謀境(1530-1607)，字巍甫，號松石，封鎮國中尉。 <sup>163</sup> 按：與從弟謀境合刻詩作為《連枝集》。有詩入《明詩紀事》。 <sup>164</sup> 謀境(1537-1619)，號松友，封鎮國中尉。 <sup>165</sup> 按：有《擊轅稿》6卷，與朱謀境合刻為《連枝集》。 <sup>166</sup> 謀塢(1558-1620)，字藩伯，別字藩甫，號浦泉，別號運宇，官諱茲生，封 鎮國中尉。 按：龍光社主要成員之一。 謀圭(1553-1642)，號敬所，封鎮國中尉。 <sup>167</sup> 按：龍光社主要成員之一。 謀埠(1551-1624)，字鬱儀，號海岳，封鎮國中尉，加封資政大夫，勅授管 理石城王府事。 謀墾(1564-1619)，號奎吾，封鎮國中尉。 <sup>168</sup> 按：龍光社主要成員之一。

161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石城多字派〉，頁87。

162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石城謀字派〉，頁184。

163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石城謀字派〉，頁186。

164 陳田輯，《明詩紀事》，第1冊，甲籤卷2下，頁75-76。

165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石城謀字派〉，頁186。

166 陳田輯，《明詩紀事》，第1冊，甲籤卷2下，頁76-77。

167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石城謀字派〉，頁200。

168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卷4，〈石城謀字派〉，頁209。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文德翼，《求是堂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4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天津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
- 王士禛，《居易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9-128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續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2-128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步青，《已山先生別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73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敦復堂刻本影印。
- 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清乾隆間武英殿刊嘉慶間後印本影印。
- 朱兆蕃主修，《盱眙朱氏八支宗譜》，美國猶他家譜學會拍攝，民國十八年(1929)務本堂本。
- 朱多賛，《朱宗良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據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原刊本攝製。
- 朱拱樞，《瑞鶴堂近稿》，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無錫俞氏刊本。
- 朱拱樞等著，《江門別言》，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刊本。
- 朱楣等修，賀熙齡等纂，《(同治)進賢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第 59 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據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影印。
- 朱謀璋，《藩獻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19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9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嘉慶二十四年(1821)扶荔山房刻本影印。
- 艾南英，《天傭子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
- 余曰德，《余德甫先生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22 冊，臺南：莊嚴文化

- 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52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刊本影印。
- 周亮工，《詩文補編·楊升菴朱鬱儀兩先生著述目錄》，收入周亮工，《周亮工全集》，第 18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據清康熙周氏賴古堂刻本影印。
- 承霈修，杜友棠、楊兆崧等纂，《(同治)新建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885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清同治十年(1871)刊本影印。
- 俞長城，《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文盛堂懷德堂全梓乾隆戊午年(1738)重鐫本。
- 帥機，《陽秋館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3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1739)修獻堂刻本影印。
- 胡維霖，《胡維霖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64-16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江西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據明刻本影印。
- 徐勃撰，沈文倬校注，《筆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徐世溥，《榆溪逸稟》，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嘉慶刻本影印。
- 徐世溥，《榆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8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崇禎九年(1636)刻本影印。
- 張鵬翥等修，熊松之等纂，《(同治)高安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847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清同治十年(1871)刊本影印。
- 曹學佺，《豫章遊稿》，收入曹學佺，《石倉全集》，第 9 冊，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內閣文庫明刊本。
- 梁章鉅，《制義叢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1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浙江圖書館臨清咸豐九年(1859)刻本影印。
- 許應鑑等修，曾作舟等纂，《(同治)南昌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812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日本國會圖書館清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影印。
- 郭子章，《豫章詩話》，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417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

- 有限公司，1997，據明萬曆三十年(1602)吳獻臺刻本影印。
- 陳允衡編，《詩慰》，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5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影印。
- 陳弘緒，《江城名蹟》，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陳弘緒，《恒山存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陳攷刻本影印。
- 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4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影印。
- 陳田輯，《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陳孝逸，《癡山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4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
- 陳際泰，《大乙山房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6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1633)刻本影印。
- 陳際泰，《已吾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原北平圖書館藏清順治李來泰刻本影印。
- 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06 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傅占衡，《湘帆堂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6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活字本刻本影印。
- 喻均，《山居文稿》，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原刊本。
- 彭孫貽，《茗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5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涵芬樓影印海鹽張氏涉園藏手稿刻本寫本影印。
- 曾國荃、劉坤一等修，劉繹、趙之謙等纂，《(光緒)江西通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65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光緒七年(1881)刻本影印。
- 舒曰敬，《皇明豫章詩選》，收入《歷代地方詩文總集彙編》，第 282-285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據明崇禎九年(1636)刻本影印。
- 賀貽孫，《水田居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08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至同治間賜書樓刻水田居全集本影印。
-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6 冊，臺北：臺灣商務

- 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萬時華，《溉園二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4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
- 萬時華，《溉園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4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
- 萬虞愷，《楓潭集鈔》，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內閣文庫藏明嘉靖四十年(1561)刊本。
- 葉舟、陳弘緒纂修，《(康熙)南昌郡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30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康熙刻本影印。
- 熊人霖，《南榮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十六年(1643)刊本影印。
- 熊文舉，《雪堂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12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清初刻本影印。
- 歐大任，《歐虞部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4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影印。
- 歐陽桂，《西山志》，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7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1765)梅谷山房刻本影印。
- 蔣方增纂修，《(道光)瑞金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第 81 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據清道光二年(1822)刻本影印。
- 鄭仲夔，《玉麈新譚》，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子部，第 38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刻本影印。
- 鄭鄧，《峩陽草堂詩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2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一年(1932)活字本影印。
- 錢希言，《二蕭篇》，收入錢希言，《松樞十九山》，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序刊本。
-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儲大文，《存硯樓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1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乾隆十九年(1754)儲氏家刻本影印。
- 戴九玄，《匡山社集》，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1635)刻本。
- 謝旻等修，陶成等纂，《(雍正)江西通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782

-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清雍正十年(1732)刊本影印。
- 謝旻等監修，陶成等編纂，《(康熙)江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3-51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羅萬藻，《此觀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92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躍齋刻本影印。

## 二、近人論著

- 丁國祥，《復社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東林党と復社》，京都：同朋舎，1996。
- 孔慶茂，《八股文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 吉川幸次郎，《元明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
- 何宗美，《公安派結社考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 何宗美，《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繁年》，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
-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 呂雙，〈地方上的天潢貴胄——明代山西宗室的生存策略與演變〉，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7。
- 李玉栓，《明代文人結社考》，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商海鋒，〈澤社、永社、雲龍社——明末桐城「詩文社集」的勃興與頓挫〉，收入張藝曇、王昌偉、許齊雄、何淑宜編，《16-18 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將出版。
- 張藝曇，〈明中晚期士人社集與思潮發展〉，收入林宛儒主編，《以文會友——雅集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頁 250-261。
- 張藝曇，〈明中晚期的思想文化風潮與士人活動〉，《中華文物學會二〇一九年刊》，(臺北，2019.10)，頁 128-136。
- 張藝曇，〈明及清初地方小讀書人的社集活動——以江西金溪為例〉，收入張藝曇、王昌偉、許齊雄、何淑宜編，《16-18 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臺北：聯經

- 出版事業公司，將出版。
- 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
- 張藝曦、王昌偉、許齊雄、何淑宜編，《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將出版。
- 梁曼容，〈明代藩王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文，2016。
- 郭紹虞，〈明代的文人集團〉，收入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518-610。
- 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 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臺北：南天書局，1998。
- 馮玉榮，〈明末清初松江士人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 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黃毅，〈明代唐宋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 鄭利華，〈前後七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
- 龔篤清，〈明代八股文史〉，長沙：岳麓書社，2015。
- Clunas, Craig. *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Societies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the Middle to Late Ming Period

I-hsir Ch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CTU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societies, mainly comprising poetry societies and eight-legged essay societies. The Furong Society (芙蓉社), a famous poetry society of Jiangxi, was supported by Yu Yuede (余曰德), a local literatus, and Zhu Duokui (朱多煃), an imperial clansman, while the Literary Classicism Movement was becoming popular nationwide. The members of the Furong Society came mostly from these two groups. During the mid-Wanli (萬曆) era, the new tendency of eight-legged essay writing arose. Many literati participated simultaneously in eight-legged essay societies and poetry societies. On the one hand, eight-legged essay writing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from literati than poetry-composing, and was mostly regarded as the main priority. On the other hand, imperial clansmen continued to run poetry societies, Longguangshe (龍光社) being the most famous, but some poetry societies were criticized severely and regarded as useless. At the same time, a new style of poetry societies was advocated by only literati, excluding imperial clansmen, of which Kuangshanshe (匡山社) is a typical example.

**Keywords:** **eight-legged essay, literary society, poetry society, clansmen, Jiangxi**